

分类号：
学号：20212004001

密级：公开
单位代码：10759

石河子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元代行状研究

学位申请人	郭昕
指导教师	杨向奎教授
申请学位门类级别	文学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所在学院	文学艺术学院

中国·新疆·石河子
2024年5月

分类号：
学号：20212004001

密级：公开
单位代码：10759

石河子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元代行状研究

学位申请人	郭昕
指导教师	杨向奎教授
申请学位门类级别	文学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所在学院	文学艺术学院

中国·新疆·石河子
2024年5月

A Study of Posthumous Biography in the Yuan Dynasty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Shihezi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literature

By

Guo x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Supervisor: Prof. Yang Xiang-kui

May, 2024

石河子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在我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研究生签名：郭昕

时间：2024年5月12日

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石河子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在学校图书馆保存并允许被查阅。有权自行或许可他人将学位论文编入有关数据库提供检索服务。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研究生签名：郭昕

时间：2024年5月12日

导师签名：胡国奎

时间：2024年5月12日

摘要

行状作为一种应用型文体，历经魏晋南北朝的萌芽期和隋唐五代的定型期，终于在宋代得以成熟。目前学界对行状通过文体溯源、功能发展演进、相类文体对比等方式展开研究。对于元代行状的整体情况，以及元代行状所反映出的当时的社会现象，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首先，元代行状的状主和作者，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身份的转变。状主层面，蒙古四汗时期，由于战事频繁，军事将领的事迹在行状中占据了很大比重，主要记录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和对蒙古帝国的贡献。到了世祖、成宗、武宗时期，这时期的行状多数集中在各级官员的事迹上。统治政策的变化、军事形势的稳定和理学的发展，共同影响了这一时期行状的主题和内容。到了仁宗即位后，文人雅士的行状变得比较突出。这反映了元朝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以及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

其次，从四等人制到民族融合的元代社会状况，也在行状中有所体现。四等人制是元代社会对不同民族实行差别待遇的制度，行状有部分内容反映了这种等级观念下对不同民族的偏见和歧视。同时，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行状中，这种民族融合的态势体现为对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和互动的记载，这些都是民族融合趋势的体现。

再次，是行状的三个特性问题。从纵向来看，影响行状真实性的主要因素也随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行状作为一种应用性文体，其雅俗属性的变迁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在宋元之际，这种变迁尤为显著。在时效性的要求上，在宋代以后，行状更多地成为个人或家族的私人记录，其完成时间不再受到官方规定的严格限制，而是根据个人的需要和情况灵活掌握。

最后，是元代行状的影响与价值。行状具备请谥、修史、乞铭这三大主体功能，元代的单篇行状除具有单独功能外，还有部分行状具备两项及以上的多重功能。出于不同功能的考虑，又存在“一人二状”的现象。行状还为相类文体提供借鉴，在说明要素方面几乎一致，而在叙事要素方面则体现出不同文体间的区别与差异。此外，不朽意识是一个深植于人类文化心理的概念，它涉及个体对于超越时间限制、名声或影响力能够流传后世的渴望，行状这一文体就是中国古人不朽意识的最佳体现。

关键词：元代；行状；状主；民族融合

Abstract

The biography, as an applied literary genre, went through a period of germination during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a period of shaping during the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It finally matured in the Song Dynasty.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biographies focuses on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genre, the evolution of its function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 similar literary form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significant room for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biographies from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social phenomena they reflect.

Firstly,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subjects and authors of biographies underwent a shift in identity.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our great khans of the Mongols, due to frequent warfare, the deeds of military generals dominated the biographies, mainly recording their bravery o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Mongol Empire. In the reigns of Emperor Shizong, Emperor Chengzong, and Emperor Wuzong, the majority of biographies focu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 Changes in ruling policies, the stabilization of military situ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collectively influenced the themes and content of biographies during this period. After Emperor Renzong ascended the throne, biographies of literary figures and gentlemen became more prominent, reflecting the Yuan Dynasty rulers' emphasis on culture, as well as the richness of social cultural life at the time.

Secondly,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Yuan Dynasty, from the four-tier system to the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we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biographies. The four-tier system was a policy of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ethnic groups in Yuan society, and some biographies contained content that reflected the prejudice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different ethnicities under this caste system. However, to consolidate their rule, the Mongol ruler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biographies, this trend of ethnic integration was manifested in the records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ities, all of which were indications of the momentum towards ethnic integration.

Thirdly,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biographi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When looking vertically,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authenticity of biographies also chang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s an applied literary genre, the evolution of the elegance and vulgarity of biographies reflects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social culture. This evolution was particularly evid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ong to the Yuan Dynasties. In terms of timelines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biographies increasingly became private records of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with their completion time no longer subject to strict official regulations but flexible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Lastly, th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Yuan Dynasty biographies extend beyond their primary functions of

requesting posthumous titles, compiling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eeking inscriptions. In addition to serving these functions individually, some biographies from the Yuan Dynasty had multiple functions, including two or more. There were also instances of ‘one person, two biographies’ due to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for function. Biographies also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literary forms, almost consistent in their expository elements but showing differences and distinctions in narrative elements between different genres. Furthermore, 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is deeply rooted in human cultural psychology, involving the desire of individuals to transcend time limitations and for their fame or influence to be passed down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e genre of biography is the best embodiment of the Chinese ancients’ sense of immortality.

Key words: Posthumous biography in Yuan Dynasty; Accuser;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目录

摘要	1
绪论	1
1、选题缘起	1
2、研究现状	1
3、主要内容	4
4、研究意义	4
5、研究方法	5
第一章 元代行状的状主与作者	6
第一节 元代不同时期的状主身份转变	6
第二节 单篇行状中的状主身份转变	11
第三节 少数民族作者的出现	13
第二章 元代行状的民族特色	16
第一节 四等人制在行状中的反映	16
第二节 文化交往在行状中的反映	18
第三章 元代行状的特性	26
第一节 行状的真实性和其影响因素	26
第二节 行状的世俗性	30
第三节 行状的时效性	35
第四章 元代行状的影响与价值	40
第一节 元代行状的当世功用	40
第二节 元代行状的不朽意识	45
结语	49
参考文献	50
附录	54
致谢	86
作者简介	87
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88

绪论

1、选题缘起

行状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中的一种形式，通常用以描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品行状貌。它不仅是传记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以往对于行状的研究，从时间断代上，主要在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而对宋代之后的行状缺乏一定的关注。从研究内容上，偏向单篇行状的历史文献辨伪，未做整体性的研究。本文聚焦元代，并将元代行状纳于通盘考虑之中，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爬梳，考论其状主及作者身份、叙事内容、特性演变、功用价值等方面的革新，整体呈现元代行状风貌。元代行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整体发展的认识，而且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元代社会的文化面貌及其历史变迁。对元代行状的深入研究，亦可以为元代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民族关系史提供一定的价值。

2、研究现状

学界对行状的研究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讨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从文学的角度对行状的研究，涉及行状文体的源流发展、叙事内容、功能演变、理论批评、写作模式与其他相类文体的对比等方面；二是从非文学的角度对行状的研究，包括行状的史料价值，行状与谥法研究等方面。至于元代行状研究，整体研究较少，多对行状与其相类文体，如墓志铭、传记等进行研究，研究角度涉及战争背景、民族融合、文化政策等。个案研究，多以对元代著名文人苏天爵、虞集、姚燧、吴澄以及其他馆阁文人的作品研究为主，其中包含有行状文。

(1) 关于行状起源与演变的研究

盖翠杰的《行状论》在论文第一章“释源篇”中，指出行状文体在汉代并未成型，只是记载人物品德、年龄的一种文字方式，以供官方察举选士等用途。在汉代，行状并未形成独立的文体，只是作为一种文字方式存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齐、梁时代，行状文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其中，任昉的《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是行状文体独立的标志之一。^①张柳《行状文文体及宋前行状文考述》认为唐代是行状的定型期，其形式上有规范的行文格式，状主多为官员和僧侣，对状主的评价有褒无贬，语言呈现“散文化”。^②与张柳观点不同的是，任春艳认为行状的定型期在南朝，这一观点强调了南朝时期行状文体的成熟和发展。任昉的创作实践对行状文体的基本体式和规

^① 盖翠杰.行状论[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2.

^② 张柳.行状文文体及宋前行状文考述[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08.

范的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作品成为后来行状写作的典范。^①沈国光《汉魏六朝行状研究》对南朝行状的源头进行了梳理，指出南朝行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一些相关文书形式。在汉代，出现了与选举制度、考课制度相关的文书，这些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南朝行状的基础。^②整体来说，关于行状起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汉代和魏晋时期两种说法上。相较而言，行状在两汉时期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立且逐步成型、隋唐时定型，这样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2) 关于行状叙事内容与功能的研究

盖翠杰的《行状论》第二部分“功能篇”，探究了行状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功能演进，认为行状的功能演变是从汉代的察举选士开始，到南北朝的请谥、立德功能，进而到唐代的议谥、作传、为撰写墓志铭提供材料等功能，此外又有辨诬、补史，以及满足其它私人目的的作用。^③俞樟华、盖翠杰《论古代的行状理论》中，认为李翱的《百官行状奏》开篇点明“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说明写状也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④沈国光的《汉魏六朝行状研究》指出南朝行状主要用于记录状主的生平事迹及品德问题，而行状的功能则主要用于上呈请谥。但对于史书编纂是否参考了行状，以及参考的程度，目前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⑤魏亚婧《〈文心雕龙〉与〈文选〉哀祭类文体比较研究》第三章第二节对《文心雕龙》的“状”与《文选》的“行状”进行比较，首先对行状的文体流变做了梳理，认为西汉是行状的萌芽期，此时仅被称为状，只有描摹被举荐者的体貌特征，列举其人的代表性事迹的功能。东汉则开始被称为行状，内容上并无变化。^⑥

单篇论文中，唐雯《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形象的制作》指出唐代官员身后形象的表现主要依靠行状、谥号、神道碑、史传，行状是中国古代用于记载一个人生平事迹、品德、功绩等内容的文献资料，尤其在官员的碑铭和史传撰写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官员去世后，行状成为了塑造其身后形象的基础。^⑦贾飞、叶舒宪的《行状文体功能演变及其文学治疗功能探究》，认为随着行状行文增长、句式多变、趋于散文化等文学性要素增加，作者的主观参与程度也得以加深，行状的文学属性逐渐凸显，因而在行状的书写过程中能对作者起到治疗内心的功用。^⑧杨向奎、杨雯铃《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认为行状的功能演变从南朝的请谥开始，唐朝则以请谥为主导，但在实际操作中也为墓志撰写提供素材，此外还有部分的唯一目的是乞铭，这种行状在北

^① 任春艳.南朝行状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② 沈国光.汉魏六朝行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③ 盖翠杰.行状论[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2.

^④ 俞樟华,盖翠杰.论古代的行状理论[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01):7.

^⑤ 沈国光.汉魏六朝行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⑥ 魏亚婧.《文心雕龙》与《文选》哀祭类文体比较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2.

^⑦ 唐雯.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85-94.

^⑧ 贾飞,叶舒宪.行状文体功能演变及其文学治疗功能探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04):88-93.

宋开始大量出现。并且宋代还出现了不以请谥、修史、乞碑志为目的的行状，实质与传记基本相同。^①张蒙《宋代行状文体研究》则指出，在宋朝，行状除主体功能从以请谥、作传为主到以请托碑志为主以外，又出现了新的功能，如藏于家中“备史氏采择”、追求与正史相辅而行、代替墓志刻石、代替文人私传、代文集之序跋等等。^②

总而言之，行状的功能发展大致为：南北朝时期侵占诔文的请谥、述德功能，唐代的请谥、修史、乞铭等功能，宋代藏于家中“备史氏采择”、追求与正史相辅而行、代替墓志刻石、代替文人私传、代文集之序跋等功能。此外，还有辨诬功能、补史功能、劝恶扬善的教化功能、弥补内心伤痛的疗愈功能等等。这为元代行状的功能演变研究提供了一定思路。

(3) 关于元代行状的研究

郭预衡、郭英德《中国散文通史·宋金元卷》认为元代的传状文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儒风盛行，以姚燧为代表的北方文风较为突出，有宗欧苏和法韩柳两种倾向，内容以表现金宋遗民心理和民族情感者居多。大德、延祐之后，元代文坛出现“治世之音”的怪异现象，以虞集为代表的南方作家主导文坛，南北文风渐趋融合，在继承欧、韩两种传统的前提下，总体上倾向于欧文之凝练、平易、顺畅。传状文呈现出多样化、灵活化的特点。其后也对姚燧、柳贯、杨维桢等人的单篇行状进行了评析。^③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元文类》《滋溪文稿》保存了大量元朝人物事迹，其中包含不少人物相关的行状、碑铭、墓志等资料。徐丽娟《苏天爵传记研究》对苏天爵所作行状中对有元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反映，以及苏天爵的写作手法、创作特色、素材取舍等作了分析。^④

功能方面，万德敬在《元代碑志的史料价值举隅——以历史人物传记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对元代碑志特别是碑铭、墓志、行状和家传等史料的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将这些碑志文本与《元史》中的名臣列传进行对比研究，万德敬指出，明初史臣在编修《元史》时，名臣列传的主要资料来源就是保存在国史馆的这些碑铭、墓志、行状和家传。这涉及行状的修史功能，但未有新见。^⑤许婷婷《溧水元代容国公容国夫人墓碑摭谈》谈到了元代色目人的“汉化”问题，并且对于墓志这一叙述的历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实，持审慎态度。她通过举例认为墓志较之于行状，又多出一重宣传与教化的需要。^⑥这个结论也比较片面，实际上，行状也具有宣扬教化的功能。

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对元代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官员的入仕、升迁、掌权以及死后的荣誉等。在四等人制的

^① 杨向奎,杨雯铃.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5(5):6.

^② 张蒙.宋代行状文体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21.

^③ 郭预衡,郭英德,李真瑜等.中国散文通史:宋金元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④ 徐丽娟.苏天爵传记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5.

^⑤ 万德敬.元代碑志的史料价值举隅——以历史人物传记为中心的考察[J].运城学院学报,2018,36(2):5.

^⑥ 许婷婷.溧水元代容国公容国夫人墓碑摭谈[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6):4.

基础上, 蒙古人、色目人(包括中亚人和西域人)、汉人和南人分别享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这种等级制度在官员的谥号上也有所体现, 不同民族和阶层的官员在谥号的授予上会存在差别。帖慧祯在《元代名宦谥号研究》中提到, 元朝的谥法制度的确立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元朝建立之前, 蒙古帝国时期并没有实行谥法。随着蒙古族对中原地区的征服和统治, 他们对汉文化的了解逐渐加深, 谥法也逐渐被引入到蒙古帝国的统治体系中。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 谥法开始以制度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并在成宗和武宗时期不断调整和完善, 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谥法制度。^①查洪德、李雪《论元代传记类文章的传奇性》认为传记作品原本应客观、真实地记录人物生平事迹, 过多的传奇笔法使得作品中的事实变得模糊和扭曲, 从而降低了其作为历史文献的传信价值, 但它确实可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手法使得作品更具吸引力, 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②李雪《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文学史实践——从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看多族士人的文化认同》尝试以元代色目人传记文为中心, 探究色目人与中原文人之间的交流互动,^③这都对本文的研究视角有所启发。

3、主要内容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而文体的发展也一代有一代之变化。行状作为一种应用性文体, 发展到元代, 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元代主要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而不同阶段状主的主要身份也不同。第一阶段, 元代行状的状态以军事将领为主。第二阶段, 状主身份以各级官员为主。第三阶段, 则以文人雅士行状最有特色。其次, 元代特殊的多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下, 从四等人制到民族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都在行状中有所反映, 具体表现为兴办儒学、学习语言、共修典籍、通婚、归附入仕等。再次, 从特性而言, 行状的真实性和实用性无论何代都有问题存在, 但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 又随着宋元之际由雅转俗的时代趋势, 行状也由多用典的雅致文风逐渐趋向世俗。此外, 行状的时效性自唐代以来也在逐渐降低。最后, 探讨元代行状的当世功用与后世价值。

4、研究意义

首先, 元代行状的独到之处不仅体现在其时代背景的复杂性上, 也体现在它们对于多元文化的吸纳与融合。在元代, 蒙古统治者建立了一个跨越亚洲大片地区的帝国, 包含了多样的民族和丰富的文化。这种文化多样性在行状中得到了体现, 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生平的记录, 也是文化交流和身份认同的见证。

其次, 历来对元代行状关注甚少, 然而元代是中国古代行状文体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强化对元代行状的研究, 可以一定程度上对行状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加以弥补, 也可以体现其在元代独特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生态下展现的时代特色和风貌。

^① 帖慧祯. 元代名宦谥号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② 查洪德, 李雪. 论元代传记类文章的传奇性[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60(1), 96-103.

^③ 李雪.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文学史实践——从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看多族士人的文化认同[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1): 161-169.

最后，通过研究元代行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民族和阶层的人们如何相互影响、互动融合。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多元的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理解和团结，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5、研究方法

文献法：通过搜集、翻阅《全元文》及元人文集，共检得元代行状一百余篇，并用图表进行归纳整理，从元代行状的特性、状主与作者的身份变化、行状所反映出的元代社会状况、元代行状的影响与价值等不同角度对元代行状进行分析。

比较法：纵向比较，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元代影响行状真实性的因素，行状创作内容、艺术手法由雅转俗的变化，行状的时效性自唐朝至元代逐渐降低，元代状主身份在元代不同时期的身份转变，行状的作者身份到元代出现了少数民族这一新兴群体，行状的创作内容反映元代从四等人制到民族融合的情况等等。横向比较，对其他相类文体对行状的继承、削减等情况进行分析。

文本分析法：首先将所搜集到的行状的作者、状主身份、创作目的、功能等情况制成资料图表，便于检索，再通过对行状文本细读，结合元代历史特点，选取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分析整合，有相似性的情况进行归纳，存在差异的情况进行辨析，最后提炼观点，完成论述。

第一章 元代行状的状态与作者

元代行状作为文献资料，为研究元代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元代行状中的状主，即被记载的人物，其身份主要分为军事将领、各级官员、文人雅士三个大类。若以元代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来分析，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状主身份的变迁。初期的元代，状主主要是跟随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等建立元朝的军事将领和统治者，他们的功绩主要在于军事征服和建立政权。中期元代，随着国家的稳定和统治手段的多元化，状主的主要身份又以行政官员为主。这一时期，蒙古族统治者开始更多地依赖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官来治理国家。晚期元代，状主身份更加多元化，文人雅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僧人行状中反映出了元代中国与其他国家互相沟通、往来的情况。元代行状中所反映的这些变化，与元代社会背景和统治阶级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

第一节 元代不同时期的状主身份转变

《全元文》及元人别集中共有 196 篇行状，若以状主身份进行粗略分类，则有 16 篇状主身份为军事将领，75 篇状主身份为文人雅士，81 篇为各级官员。但若按元代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不同时期状主的主要身份又各有不同。

元代文化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第一阶段为蒙古四汗时期（1206-1259）。在这一时期，蒙古帝国迅速扩张，包括了现在的中国北方以及更广泛的地区。1234 年，蒙古军队灭掉了金朝，从而控制了原本由金朝统治的北方农业地区，这些地区在当时被称为“汉地”。中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这种文化历来在汉地占主导地位。然而，蒙古统治者在长期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儒学文治的重要性。成吉思汗本人虽然接触过一些“汉地”士人，如契丹人耶律楚材，但他们的被起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儒学背景，而是因为其他技能，如耶律楚材因其占卜能力和文书写作技巧而受到重用。他们对佛、道二教也感兴趣，对于各种宗教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如蒙哥汗“酷信巫覡卜筮之术”，但“自谓尊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①，所以对于儒学还是一种漠视的态度。这个时期战乱频仍，引得谢枋得直呼：“嗟呼！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②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也称：“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③虽有夸张

^① (明)宋濂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54.

^②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 第 355 册 卷 8217[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01.

^③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78.

成分,但也可见蒙古统治者之凶狠。在蒙古帝国的早期阶段,枢密院尚未成立,中书省掌握了兵权,因此在官员选拔和任用上,更多地倾向于使用军事人才或者具有军事和行政双重才能的人物。在这个时期,许多军事将领因为军功被封赏,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帝国的过程中,废除了原有的部族和氏族制度,将所有的游牧民族编入九十五个千户之中。这些千户由蒙古贵族和有功的功臣世袭统领,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保证了蒙古贵族和功臣的权力和地位,如《千户高君行述》就指明:“高君讳忠义,族世出肃慎氏,当金之存,世袭千户。”^①

军事将领行状通常侧重于描述状主展现出的军事才能,如郝经所作的《乔千户行状》:“武仙奔,公会诸军追之,馘虏甚众,遂会攻彰德。转战至齐、鲁,驻军滕州牙山,中夜敌出不意,袭垒而入”,此千钧一发之时,“公独骑追战,奋戈大呼,横冲逆击,诸军始觉,噪以继之,敌众骇散,填山湮谷而奔,于是公名震河朔矣”^②。将反应迅捷的乔惟忠与略显迟缓的大军进行对比,一位机敏果断、智勇双全的军事将领形象顿时跃然纸上。而后乔惟忠自然也因军功赫赫得到了封赏:“岁甲午,朝廷论功,张公陞奏曰:‘臣凭藉国家威灵,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亦臣有一二爪牙熊虎之助。臣之副将乔惟忠,战功甚多,乞加宠异。’于是朝廷以玺书金符锡公,仍以千户世其封。”^③不过,因为千户兼具行政与军事的双重功能,所以行状也会对军事将领在行政方面的德业功绩加以描述。如《千户高君行述》:“性质直,不好浮屠老氏,见贫困者,即解囊调给无吝容。渡江之役,汴梁多逃军,黄河置禁甚严,不得脱。则往往于民家傭雇,或乞食市井狂活,君辄饷粥之,且喻以理法勿为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遇俘掠男女,骸骨暴露道路间,出私钱收埋,不知数。”^④寥寥数笔,就可见高忠义之关心民瘼,爱民如子。又如《故金卫上将军景州节度使贾公行状》记载了一位金元之际的军事将领贾德的生平经历:“初,州将以甫离抢攘,人心转侧,颇任刑立威,所犯有事重而情轻者,有情连而力吓者,公为祈理营救,多所昭雪,以从轻议。”^⑤可以看出,贾德虽为军事将领,却是粗中有细,能够体谅民情,最大限度地帮助民众免于刑罚之苦。

除了军事将领,元代前期的行状,也能反映出思想文化领域总体上呈现一种复杂、矛盾的态势。王朝易祚,南宋遗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创伤,因此,还是有一定的坚持守节、不愿屈服的遗民群体。在这一时期的行状中,在行文过程中流露出对遗民不屈气节的赞扬。如《徐侍郎逸事状》,宋德祐年间,北兵渡江,众人流窜,“独公彷徨不忍去”,原因是“自古无走台谏”^⑥,可见徐卿孙责任心之强。后来,平章政事贾似道因体力不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卷 430[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17.

^②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卷 13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79.

^③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卷 132[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79.

^④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卷 430[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18.

^⑤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卷 180[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25.

^⑥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卷 86[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76.

支，想要议和，但是“公毅然不从”，作者不禁感叹：“呜呼，壮矣！”南宋晚期，局势震荡，像徐卿孙这样忠心耿耿之臣实为少见。又如《大元故御史中丞赠资善大夫上护军彭城郡刘忠宪公行状》：“至元十二年，除户部郎中，改行省郎中。从丞相伯颜、平章阿术统军平江南，自武昌顺流抵镇江，取瓜洲。立行省，供给军须靡有缺乏。禁止杀掠，抚安新附，所过州郡按堵如故。凡便益之事，多出赞画。以丞相命赴阙进捷书，世祖皇帝亲问南征事势，应对称旨，赐器服宠嘉之。江南既平，作诗百韵，铺张伟绩。宋臣有能死节守义者，必加叹奖。”^①这里就记述了元代前期平定江南之后，状主刘宜作为元代官员，对于南宋遗民以身殉国的忠义并没有加以轻视，反而充满了“理解之同情”，感叹于他们的勇气与执着。

第二阶段是世祖、成宗、武宗时期（1260-1313）。这一时期以各级官员，尤其是文官的行状居多。这主要受到统治政策、军事形势、理学发展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政策利好。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改革，“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②。他多次表达了尊重儒学的态度，孔子是儒学的象征，忽必烈为了施行文治，采取了若干尊孔崇儒的措施，如新建各级地方官学、建立中央国子学，学习儒家经典，培养统治人才。成宗时期，下诏建立大都宣圣庙，作为举行祭孔典礼的场所。武宗“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③，因而“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④。可见统治者对孔子的推崇，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举动，无疑赢得了当朝儒士的好感。其次，元朝的汉族官僚李璫、王文统反叛朝廷的行径败露以后，引发了忽必烈对汉人官僚的严重猜忌，元廷对汉族官僚尤其对汉族军将的防范日渐加强，汉人担任军事将领的机会大幅减少。如此，也无怪乎这一阶段军事将领的行状偏少，而文官行状的比例能够相对上升了。最后，还有元代理学呈现出官学化、伦理化的倾向。1235年，儒生赵复在燕京开办太极书院，理学得以北传。后来，接触到理学的许衡及其弟子掌教国学，在其大力推广下，理学成为官学，更扩大了理学的传播范围。许衡提出：“公刘古公之俦皆生于戎狄，后世称圣贤焉。岂问其地与其类哉！元之君莫不以与古圣贤并论，然敬天勤民，用贤图治，盖亦谙于中国之道矣。”^⑤可见元代理学致力于为元代统治的正统地位提供理论依据，这也为遗民出仕元朝解除了相当大的心理障碍。

总而言之，由于元朝统治的巩固，故宋已经绝无复兴的可能，大多数汉人、南人中的士人，对于故朝的孤忠也随着时间被冲淡无几。因此，他们能够及时扭转心态，认同元朝的统治，积极入仕，发挥余热，主动为元代统治者服务。如《故集贤直学士大中大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卷 510[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51.

^② (明)宋濂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元史 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54.

^③ (清)刘沅著,谭继和,祁和暉笺解.十三经恒解 笺解本[M].重庆:巴蜀书社,2016:167.

^④ (清)魏源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元史新编 卷八[M].重庆:岳麓书社,2004:202.

^⑤ (元)许衡撰,许红霞点校.许衡集附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9:629.